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本质

著 [美] 马修·梅尔科 (Matthew Melko)

译 陈 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7 - 382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本质 / (美) 马修·梅尔科著; 陈静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知识分子图书馆)

书名原文: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

ISBN 978 - 7 - 5203 - 0909 - 7

I. ①文… II. ①马…②陈… III. ①西方文化—文化史—研究
IV. 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11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瀚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 问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 编 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史慕鸿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郭沂纹 章国锋 谢少波

总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

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

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

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

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须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焯、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

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年10月于北京

关于作者

梅尔科博士写道，他拥有“阿尔弗雷德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个学位”。从1959年起，他就一直“在马斯布拉德福专科学校从事历史及社会科学的教学”。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

“我对于比较历史学的兴趣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的肯尼斯·汤普森激发起来，然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在马丁·莱特的指导下，这种兴趣变得炽热起来。此后，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比较历史学家。（备注：汤因比曾在一辆驶往海滨的13路汽车的后车厢向我挥手作别；道森有一次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吃茶点时，对他在‘只有40岁’时写就的某些东西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奎格利曾在华盛顿对艺术教学高谈阔论，因此高高兴兴地错过了一次历史学会议；库尔伯恩在布拉德福一次学术会议的进程中，穿着腥红的长袍，满脸胡子，神态威严。）”

“在比较历史学方面，我最近做了一些尝试：对52个和平社会进行了研究。我很快就能够模糊地理解那些国际体系的研究及文明本身。但是毫无疑问，我是所有研究比较历史学的学生当中最不称职的一位。我没有任何语言的技能（‘他们会对你不加理会，如果你没有任何德文注脚’——海登·怀特），我读书很慢，而我本来就不好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我所拥有的优势是我的一种写作冲动，我没有任何可以让我分心的其他成就，还有一种强烈的无须为此承担后果的感觉。”

献给马丁·怀特

致 谢

1968年，四位学者相继谢世了。他们每一位都和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有一段渊源。人们将会怀念他们。

比地林·索罗金是宏大规模上的比较历史学家：他在处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任务上完成得相当出色。他曾经在一个注脚中这样评论道：“迄今为止，历史的发展遵循着我所设立的轨迹。”他对一位批评家做出了强烈的回应：“让那些能做得更好的人做得更好；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拉什顿·库尔伯恩这位比较历史学家喜欢一丝不苟地专注于一些特定的、循环发生的现象：封建制，教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文明的起源。库尔伯恩在东方文明的学识超越了任何一位比较历史学家，他未能活着完成一项综合研究是人类的巨大损失。克兰·布林顿是一位梳理并阐述了历史几大主题的叙述史家。他坚信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应该会有不同的方法，并且极力倡导比较及叙述两种方法的联姻。哈罗德·戴维斯是一位专攻教学的历史学家。他极为广泛地涉猎各类历史，让他的学生关注更广泛的问题或者是可以比较的问题。他徜徉于索罗金、库尔伯恩以及布林顿所开创的学术氛围，并且增强和传递了这一学术氛围。

以上四位学者均对本书产生了影响。索罗金的社会哲学渗透在理论的框架中；库尔伯恩在我所在的大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在此期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思考比较历史学作为

一门学科怎样发展的问题；布林顿，尽管承受着绝症的折磨，仍评阅了该书的手稿并且给该书写了序；戴维斯在该书的初始阶段阅读了手稿并且在该书定稿的时候给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在我收集材料和探索方向的三年期间，她经受了离别之苦；同时，我还要感谢肯尼斯·汤普森和弗雷德里克 L. 舒曼对我早期研究灵感的激发；感谢唐宁·伯乐、海登·怀特、欧斯蒙·海拉以及马克·卡罗尔对书稿的评价；感谢哈罗德·琼森夫人、克莱·维尔西·坎尼夫，及莫利·诺伊斯所做的准备工作；感谢塞奈·古科尔·古尔梅，在百忙之中起草、粘贴了第五章的图表；感谢理查德·纽曼设计了封面；感谢《现代思想主流》的编辑，帮我出版了第一章的早期版本（1—2月，1965）；感谢我的编辑，以斯帖·多提，敦促我让此书更加紧凑清晰，结构合理。但是倘若没有马丁·莱特的指导，就没有这本书稿的批评、打印及编辑。

不言而喻，以上提到的需要感谢的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将会同时乐于为此书的缺陷和疏漏承受批评，因此我无须承担任何的责任。

马修·梅尔科

1969年

序 言

人们都知道，吉本曾凝视着古罗马的废墟，当场决定着手为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插图注解。同样，历史学家们对于事物的生与死这一事实也有充分的了解；他们的确试图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解读生命的过程。因此，即便是最缺乏想象力的叙述史家，对阿诺德·汤因比所指责的“摒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也会觉得不那么公平。的确，他们所描述并且常常以一种相当受人尊敬的方式所分析的生命的进程及其兴衰的循环，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实体，可以详细地规划，准确地定位，并且可以在时空上划定界限。古代的城市国家，现代的民族国家，甚至一些封建实体如巴伐利亚和布列塔尼，即便是在某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的疆界都一直没有划定，也值得用一个充满活力的、为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们所喜欢的一个形容词来描绘——“坚固”。它们不像个体的人那样坚固，但人们却可以确定它，划定它的界限，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将其分离出来。的确，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对这种联系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修西得底斯。但是，研究外交史、军事史、经济史以及当今研究知识史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把它们作为可以限定疆域的政治实体在进行研究。有关美国新的共和体制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中的人权法案对早期法国革命家的影响这一主题，对于极端的还原论者来说，有些小题大做，但却可以被文献加以证明和

定义。

尽管历史学家们并不刻意回避使用诸如“文明”“文化”及“社会”这样的词汇，但他们通常仍然不愿给这些术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完成。尽管在西方文明史方面，或者仅以文明史而言，就有大量的教科书，尽管世界史方面的书籍也是数量极多，且难以领会，但是这些书几乎都很难算是真正的比较文明史。虽然西里尔·布兰克是一位杰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比较史学家，而且所关注的问题比起“狭隘的”（用汤因比具有隐含意义的词语来说）民族国家要宽泛一些，但他仍然认为“文明”一词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来说并不可行，并不起作用。

对超越“主权”国家的更广阔的发展范围绘出图表、进行分析、做出解释的尝试至少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或是阿若修。曾经有人试图把这种尝试叫作“历史哲学”，而这一混合术语却同时遭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质疑，也被传统的社会学家所摒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术语毫无意义，或者比毫无意义更为恶劣。弗兰克 E. 曼纽尔在他的《哲学历史的形态》一书中用令人钦佩的学识、相当程度的赞同及恰当的怀疑态度简要地追溯了这种历史的历史——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鉴于转向这种历史的学者当中很多人都极具天赋，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种历史所表现出的纯粹的轻蔑态度很难解释。毫无疑问，统一于全国性研究协会的从事纯理论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的完善的学术精神，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历史哲学家们所做的这一类归纳。兰克，他们的创始人，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序言中，不无骄傲地、毫不谦虚地表明他不会试图解释历史的进程，而只会“仅仅（的确是一个关键词）展示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已故的 H. A. L. 费歇尔，在一篇使汤因比大为光火的序言中作了类似的声明：他不是真的想找寻历史的意义，但如果有一系列使他着迷的疑惑不解的

问题，那他也会十分喜欢。

的确，那些在 18 世纪及 19 世纪被启蒙学派称作为“哲学历史”的学者，如孔多塞学派、康德学派、巴克耳学派，他们都是单纯的冰退阶段及单线演化发展理论的理性主义阐释者。他们只关注现在普遍地——非常普遍地——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东西。人们不能指责那些 20 世纪的后继者们，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甚至也不能指责索罗金，尽管他热衷量化方面的研究（对于这一点，马修·梅尔科在此书中所表现出的善意略显过分）。这些作者，即便是斯宾格勒，也没有放弃逻辑归纳，却对于直觉、从事实到理论的富有想象的跨越、归纳概括及牵强的假设有着相当的依赖。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持有类似的见解，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流派，即对民族性的研究。确实有一种特性，真实到足以称为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但是，例如说，如果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从这样一个事实——拉丁语的 honor, furor 变成法语 honneur, fureur 后，音节中多了虚弱的卷舌音 eu，但是拉丁语的 amor 变成法语的 amour 后，却多了动听的、充满激情的元音 oo——得出结论，即对法国人来讲，爱情重于荣誉，他显然有些小题大做。汤因比有许多真知灼见，几乎可以配得上“富有洞见”这个金子般的词语，但是他的那些观点却无从考证；在最大范围的总结归纳上，索罗金的概念的一理想的一感知的这一冰退阶段的准则难以与对历史学家们来说清晰明了的连贯的整体相调和。

在本书中，马修·梅尔科有意识地避免受到人们的指责。这些人们认为，如果这种历史不能通过我们大家的理解、或是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方式被充分证明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的话，那么它就毫无希望地偏离了充分思考的方式。当然，梅尔科毫不隐晦地向他之前的一些研究人员借鉴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克罗伯以及已故的拉什顿·库尔